

SHEHUIXUE SHIYE ZHONG DE
BUXI JIAOYU

社会学视野中的 补习教育

闫 闯 / 著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补习教育的兴起
作为“政府活动”的主流教育与作为“社会活动”的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与应试教育：互为因果的两重关系
解读补习教育盛行现象的另一视角：象征性秩序
集体行为：学生参加补习教育行为的性质归属



人民教育出版社

SHEHUIXUE SHIYE ZHONG DE
BUXI JIAOYU

社会学视野中的 补习教育

闫 闯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琳娜 钟金铃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视野中的补习教育/闫 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01-019223-9

I. ①社… II. ①闫… III. ①补习学校-教育社会学-研究 IV. ①G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4853 号

社会学视野中的补习教育

SHEHUIXUE SHIYE ZHONG DE BUXI JIAOYU

闫 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19223-9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 CHA120138)

序

作为民族振兴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教育事业历来受到国家与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 年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曾明确规定,要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4%,表现出政府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决心,而且诸如此类大力投入发展教育事业的政策和规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正是这些举国关注、倾力投入的规定与举措的不断出台和践行,使得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促进国民经济和公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依附于教育事业周围的其他事物和现象,也在这场教育事业大发展的“东风”中乘势而起,借机壮大了自己,比较典型的就是有着“影子教育”之称的补习教育。如今,补习教育已经成长为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数量众多的社会成员,这从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各种补习招生广告及不断壮大的参加补习教育的学生规模中便能见得一斑。这种以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补习教育,是在正常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①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学校教育(主流教育)的“服务”属性是当前补习教育日渐势大的

^① 参见薛海平、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重要原因,^①但相对于主流教育的“额外”属性,却使得补习教育被视为加重学生负担、妨碍素质教育推进的始作俑者而广受诟病,尤其是在以“减负”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过程中被教育管理部门所坚决抵制,严厉打击。

然而令人不解和吊诡的现象是,一方面是教育管理部门的“打声不断”;另一方面却是补习教育的“屡禁不止”,逆势而生,日渐势大。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4 年有关教育支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调查的城镇在校生中,有 55.5% 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②除此之外,补习教育身上还有很多令人费解的情况存在着。比如,在笔者和课题组成员们针对补习教育进行的相关调研中,有学生和家长向笔者和课题组成员们抱怨,这种冠以“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收费颇高。这一涉及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种社会单位层次,又违背现行国家法律规定的补习教育究竟应被我们如何认识?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和家长抱怨补习教育机构收费高但教学质量偏低,如果他们所言属实,那么常态本应是“优质高价”的市场规则在补习教育现象中便发生了扭曲和改变,那些补习教育机构的经营者们则会在“低质高价”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攫取到更为可观的经济利润。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同样抱怨的还有数量不菲的补习教育机构经营者们,他们的抱怨内容集中在“投入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低”。两相对比,学生、家长和补习教育机构经营者两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从学生和家長口中的“收费高”到经营者口中的“利润低”,一高一低,我们不禁要追问这其中“消失的利润”究竟流到了何处?与此同时,纵使如此“质量参差不齐,收费颇高”,让人难感满意,但参加补习教育的人数却依然居高不下,其中原因又该如何理解?随着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对于补习教育的关注和思考的不断深入,更多有待回答的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对此再做简单列举,如在以往的观点和认识当中,应试教育情境的出现

① 学校教育或校内教育为当下国内教育体系中的主流教育形式,本书称之为“主流教育”。

② 参见薛海平、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被认为是补习教育盛行的重要原因,但笔者和课题组成员查遍相关资料,发现关于应试教育几无成文规定存在,以至于对其内涵的概括都只能依赖学者们彼此间并不统一的各类观点,可以说应试教育并不是严格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因此也并非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有意设计,那么应试教育的出现过程如何?其与补习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否又真如当下学界理解的一般无二?关于补习教育盛行的原因是否还有他说?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认为,涉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众麻烦”(Public Trouble)就构成了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多方面力量共同参与解决。虽然补习教育不至于被称为“公众麻烦”,但其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育现象,而是一个涉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复杂社会现象,“属于超越了个人局部环境和内部世界的公众事务”,^①需要教育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共同参与其中,深入探析。在社会学看来,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都会有某种隐秘的事物存在,“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②笔者和课题组成员于2012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得以开展“学生校外补课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其间课题组成员们不畏辛苦,深入实地,历时三年有余,先后通过查阅补习教育领域相关资料文献、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对补习教育相关参与者(补习学生及家长、补习教育机构经营者和补习教育机构中的教师等)深入访谈和实地扎根长春市H补习教育学校等研究方法,获取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和二手研究资料。为了系统整理和概括这些资料内容,发掘提炼其中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期对补习教育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将上述资料内容整理成书,主要围绕以下十个主题开展了分析与讨论。

第一,关于补习教育现象的现有认识整理。近些年来,学生参加校外补习教育现象发展迅速,补习教育机构及各种招生广告随处可见,学者们关于

① 赵铁:《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整合》,《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

②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页。

这一现象的分析和讨论也从未停息,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学生校外补习教育这一复杂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断言其利弊大小、价值高低,而应充分有效地掌握和理解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基础信息,了解其目前的研究状况,以便正确认识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现象,并为后续研究内容的深入展开做好准备。为此,我们需要认真梳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包括怎样客观地、科学地看待学生校外补习教育;学者们和社会成员们关注了这一现象中的哪些领域,研究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发现,有哪些观点存在争论,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等。

第二,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补习教育的兴起。时代背景作为社会现象所处的整体社会环境样态,对于社会现象的生成和出现有着生动的发生学解释能力,进而成为众多具体问题的研究起点。在笔者看来,补习教育及其经营机构于近些年兴起并盛行,与人类社会从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宏观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在个体化社会发展趋势生成和推进过程当中,人们在建构集体性时代发展起来的各种大型集体和社会组织不断消解和重组,社会生产体系日益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诸如网店和各种个人工作室等新型社会组织单位不断涌现,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日常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全方位的影响。^①在这其中,教育领域也同样经历着个体化社会来临前的种种冲击和影响,而作为教育个体化供给和消费发生单位的补习教育机构的出现,便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反映。

第三,从社会行动视角分析补习教育性质。现有的观点和认识多将补习教育视为“影子教育”,即补习教育作为主流教育的影子而存在,但也有学者质疑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影子教育”性质,认为在中国这种市场经济逐步深化的国家,补习教育已经走出主流学校教育的“阴影”,机构化、规模化、产业化等特征明显,发展成为一个正式行业、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甚至

① 参见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2页。

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这种教育已不再是“影子”,而是主流的一部分了。^①笔者在借助社会行动视角研究分析补习教育的过程中发现,补习教育在空间、规则和资源方面与学生校内主流教育存在着极大差异,可以说与主流教育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现象,笔者认为补习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主流教育则是一种“政府活动”。

第四,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逻辑困境及其行为偏差。由于现有研究大多将学生校外补习教育视为一种不可再分的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分析了补习教育的社会成因、社会影响等宏观内容,所得研究结论也过于宏观、抽象。为了深入发掘补习教育中相对微观的构成要素并有效解释补习教育的实际运作逻辑,笔者在微观层面对补习教育机构开展了具体分析,即通过借鉴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成果,阐释和分析了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以及由两种环境所分别派生出的经营型逻辑和服务型逻辑,同时,通过寻找补习教育现象中“消失的利润”,来认识补习教育机构在回应上述两种不同制度要求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行为偏差。

第五,补习教育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笔者根据在长春市H补习学校长期实地研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运用社会学中的资本理论,从微观角度对补习教育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真实地还原了补习教育情境及其中的运作过程。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参与补习教育现象的不同行动者都是一定数量资本的持有者,他们进入补习教育机构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转换,其各自的行动策略都是谋求最大转换率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补习教育机构是一个供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完成转换的资本转换场,其中生长着的功利主义理念与主流教育中的平等原则截然不同。

① 参见陈全功:《补习教育的地域延展及其社会效应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第3期。

第六,补习教育与应试教育。从补习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出发,笔者从微观层面探析了补习教育盛行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应试教育并不是一种严格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而是一种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片面的观念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个体社会成员在“理性地”谋求自身收益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形成的“集体困境”,其中充斥着个体理性和个体利益。同时,笔者认为补习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关系。具体而言,伴随着应试教育情境的形成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演变,在应试教育的生成阶段当中,补习教育等因素促成了应试教育情境的出现,在应试教育的维持阶段当中,应试教育反过来促进了补习教育的盛行,而随着应试教育的出现和补习教育的盛行,又导致了社会总成绩水平的提升和分数贬值现象的发生,最终使得参加补习教育由最初的个体选择演变成为当下的集体困境。

第七,补习教育与象征性秩序。从补习教育背后体现着的象征性秩序出发,笔者从宏观层面探析了补习教育盛行的原因所在。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传统“精英教育秩序”虽然已经为国家的正式制度所废止,但其死而不僵,这一秩序及其中内容仍然在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存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头脑当中,继续发挥着它曾有的制约社会行为的作用——使得这些成员较以往一般无二地倚重高考和高等教育,仍然将大学生视为以往的天之骄子和未来的国家干部等,笔者将这种曾经的“精英教育秩序”称为“象征性秩序”。这种象征性秩序及其生成机制的客观存在,不仅直接促成了补习教育现象的盛行,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着当下的主流教育秩序——大众教育秩序,成为诸多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

第八,从集体行为视角分析补习教育性质。笼统的补习教育实则包含着两类重要的社会现象,一类是组织补习教育的现象,另一类是参加补习教育的现象,两者分别从运行和参与角度彰显着补习教育的社会存在。笔者认为由个体社会成员私人组织经营的补习教育并非传统认识中的“影子教育”,而是不同于主流教育的一种“社会活动”。同时,笔者也认为当下学

生参加补习教育行为热的现象也并非一种常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非常规的集体行为,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若任其发展,不加规制,将愈加偏离现有教育规范,引发诸多问题,成为可能伤及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集体顽疾。

第九,学生参加补习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弥补前述讨论内容中单纯定性研究的不足和欠缺,同时检验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在定性研究中形成的部分观点及结论,笔者针对长春市和抚顺市四所高中学生参加补习教育的情况开展了实证分析。通过整理和分析数据资料,笔者发现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与“象征性秩序”等因素的作用,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学生年级排名、学生所在年级、就读学校类型等个体因素对学生是否参加补习教育没有显著影响,从而使得补习教育对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补强作用。同时,笔者还发现补习费用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在不同收入类型的家庭中存在极大差别,此时“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支出比例的下降”并不绝对表明一个家庭收入较高或较为富裕,表现为一种“反常恩格尔系数”。

第十,关于补习教育现象的规制分析。补习教育现象的两个主要面相——“社会活动”和“集体行为”——都客观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瑕疵和问题,干扰了补习教育及相关事物的和谐健康发展。如“社会活动”面相下的补习教育深深地嵌入于社会环境之中,受市场规律影响颇深,因而常常发生为片面追求经济利润进行的虚假宣传和违规招生行为,而“集体行为”面相下的补习教育也因其中充斥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参加补习教育行为不断蔓延,成了限制个体行为选择的集体困境和非常规现象,因此,对补习教育进行有效规制势在必行。但是,由于两种补习教育面相都冲击和挑战了以往的传统认识,造成了基于传统认识建构的规制工具与作为规制对象的两种面相之间的矛盾、错位,严重影响了规制效果的实现,为了有效解决上述规制过程中的问题,笔者主张以制度建设实现对“社会活动”面相下的补习教育现象的规制,以环境建设实现对“集体行为”面相下的补习教育现

象的规制。

诚如笔者所认为的,补习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言其复杂,一是其中缠绕和发生的话题绝不仅仅局限于笔者所思考和讨论的上述内容,只是笔者认为上述所挑拣话题关乎补习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骨骼”,相对重要,在这些内容上的思考和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更直观、更客观地认识补习教育,但难言全面、完整;二是这一现象也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渗透在整个社会领域当中,因此有必要对补习教育中涉及的众多社会要素开展多学科、多背景、多视角的综合性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期待着自身所做工作不仅是引入一种看待和分析补习教育现象的社会学视角,更期待就此话题引起学界同人们的深入思考和激烈讨论,以诞生出更加绚丽的思维之花和理论之树,推动补习教育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若能如此,作为引玉之砖,对于本书的写作目的而言,也算得圆满。

闫 闯

2017年4月底于长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补习教育现象研究的现实考察	1
一、补习教育现象现有研究文献和相关调查的实证分析	2
二、补习教育现象现有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8
三、补习教育现象现有研究的综合评价	15
四、进一步开展补习教育现象研究的建议	18
第二章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补习教育的兴起	22
一、集体化社会与社会化教育	23
二、个体化社会与个体化教育	28
三、个体化教育与补习教育	32
四、展望未来:不断发展的补习教育	34
第三章 社会行动视角下的补习教育性质分析	36
一、“影子教育”:补习教育性质的现有认识	37
二、补习教育性质的社会行动分析框架	39
三、社会行动视角下的学生校外补习教育性质分析	43
四、作为“政府活动”的主流教育与作为“社会活动”的 补习教育	53
第四章 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逻辑困境及其行为偏差	56
一、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对于组织环境与逻辑的阐释	58

第一章 补习教育现象研究的现实考察

补习教育在近些年发展迅速,规模日益扩大,各种补习教育机构及招生广告随处可见,许多在校学生不同因素的驱使之下,参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补习班,使得补习教育成了影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热门社会现象。由于这种校外补习教育收费颇高,参加补习教育不仅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还增加了他们所在家庭的经济负担,这些影响直接引起了来自社会中的多种声音。面对社会各方的不同态度和反应,学生校外补习教育仍未停止其不断发展和壮大的步伐,并已经成长为当今社会教育体系中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补习教育现象的社会意义,进而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其利弊大小、价值高低,而应有效地掌握和理解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基础信息,了解其目前的研究状况,以便正确认识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现象,并为后续研究内容的深入展开做好准备。为此,我们需要认真梳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具体包括怎样客观地、科学地看待学生校外补习教育,学者们和社会成员们关注了这一现象中的哪些领域,研究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发现,有哪些观点存在争论,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等。本章内容将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一、补习教育现象现有研究文献和相关调查的实证分析

补习作为一种与教育活动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一般是指社会成员为了补充或者提升某种知识技能,从而在业余或课外时间里进行的个体学习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补习现象的发展历史堪称长久深远,但补习教育作为一种学生在校外参加的专门化的补习活动,却是随着近些年个人和团体助学力量的兴起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出现的时间较短,而关于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研究历史也因此相对较短。根据笔者和课题组成员的考察,补习教育在国内的研究起点可以推至 1997 年。

(一) 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研究文献概况

以中国知网(CNKI)及相关资料网站载有的文献资料作为基础进行统计时,能够发现,虽然其中有关学生补习的文献资料数量颇为丰富,但绝大部分与本书所关注和分析的学生校外补习教育无关,其大多是关于学生所在学校自身组织并由校内在职教师负责的校内补习现象的研究,而真正揭开校外补习教育研究序幕的则是国内学者王有升。王有升于 1997 年在《上海教育科研》刊物上发表《补习教育:一类不可忽视的教育现象》一文,文章区分了学生校外补习教育与以往校内补习活动之间的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含义、起因、特点和影响做出了初步的分析和界定,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持续开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于此之后,关于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研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快速发展,而是虽亦有所发展,但研究进展缓慢,研究成果的影响也相对较小,直到 2005 年,这一状况才有了新的改变。2005 年雷万鹏在《教育与经济》刊物上发表《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一文,文章使用 1 万人样本对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也是对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首次大规模实证调查,其中使用的数据资料和形成的补习状况、影响因素和政策启示等实证性研究

结论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其后,彭湃于2008年在《比较教育研究》刊物上发表《“影子教育”: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一文,文章全面介绍了国外已有研究成果中的课外补习性质、供给和影响等内容,对国内重新认识学生校外补习教育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启蒙作用。在本土实证研究和国外相关理论推介的双重支持之下,关于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研究开始逐步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参与相关研究的学者数量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也就此出现,如宋洪珍(2008年)的《教育补习之评价研究》,王吉(2008年)的《关于补习教育的再思考》,陈全功(2009年)的《课外补习、贫富差距的映像与代际变化》,薛海平、丁小浩(2009年)的《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钱国英、唐丽静(2009年)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机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深圳的调查》,董苾芬、刘新玲(2009年)的《有偿家教的历史和现状——基于文献研究的综述》,武文浩等(2011年)的《广州市小学六年级学生教育补习情况研究——基于学生家长的视角》,陈全功(2012年)的《补习教育的地域延展及其社会效应分析》,等等。此时,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质量上来看,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研究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冷到热、从零散到系统的研究历程,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逐步向好的研究态势。

根据笔者和课题组成员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到关于“补习教育”的相关研究文献共计151篇。(见表1-1)其中,期刊论文102篇,占总体研究成果的67.55%;硕士论文39篇,占总体研究成果的25.83%;理论集刊1篇,占总体研究成果的0.66%;重要报纸6篇,占总体研究成果的3.97%;学术会议论文3篇,占总体研究成果的1.99%。(见图1-1)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态势,具体从1997年的1篇增加到2014年的40篇,发表研究成果的刊物范围也逐年扩大,薛海平、丁小浩的研究成果——《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更是于2009年发表在国内教育类的高级别刊物《教育研究》当中。

表 1-1 关于“补习教育”研究成果年度统计表

年度	1997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成果数	1 篇	2 篇	4 篇	3 篇	7 篇	10 篇	15 篇	16 篇	20 篇	33 篇	40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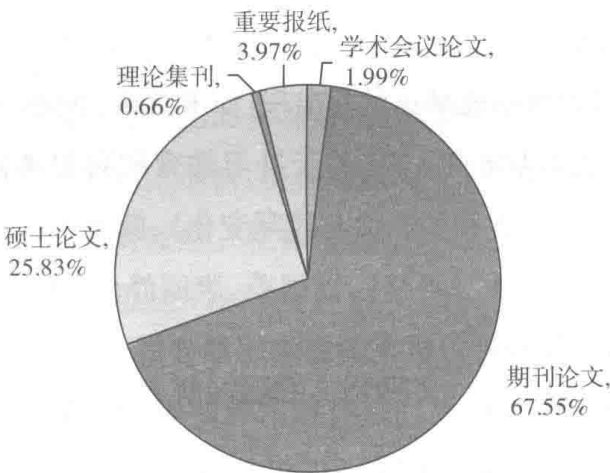


图 1-1 关于“补习教育”研究成果分布

(二)有关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调查情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条件,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为了获得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就必须依托真实有效的调查研究。根据笔者和课题组成员的考察,近年来国内就学生校外补习教育的大规模调查还没有出现,在现有关于补习教育现象的调查当中,以区域性中等规模和小范围的调查居多,其中主要的调查包括: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04年)委托国家统计局实施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采用的样本数据共包含有一个在校生的城镇家庭 4772 户,也即涉及的城镇在校学生共 4772 名,所获数据主要涉及 2004 年城镇居民家庭及个人基本情况、受教育和培训情况、家庭教育支出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工作经历和收入情况等。^①

^① 参见薛海平、丁小浩:《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教育研究》2009 年第 1 期。